

語言

澳門的語言教學與東西文化交流*

楊秀玲**

引言

九十年代的澳門，經過近一、二十年的飛速發展，隨着幾項大型建設的竣工和基本設施的完善，一躍成為亞洲的現代化城市。從飛機上俯視美麗的澳門，使人禁不住讚嘆這在中國南海之濱的又一顆璀璨奪目的東方明珠。當然，澳門作為一個微型的國際都會，其最大的魅力，是她那獨特的歷史文化，豐富的宗教、民俗、建築和藝術寶藏。澳門以其四百多年的中葡人民和平友好相處所創造的豐碩的中西文化交匯成果聞名於世，並深深地吸引着中外學者。

在踏入新世紀、新千年的倒數時刻，澳門這一“上帝聖名之城”，又一次面臨種種機遇和挑戰，文化活動十分活躍，各項文化事業欣欣向榮。那四時不斷節慶、國際學術研討，使世界一流的藝術家、專家和學者雲集我們幸運的澳門，創作和出版事業也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僅以期刊為例，澳門一直堅持定期出版的文化學術刊物達十數種之多，有中、英、葡三語的《文化》雜誌，葡文的《澳門》雜誌，中葡雙語的《行政》雜誌，英文的《澳門研究》和《歐亞管理學報》，中文的《濠鏡》，《澳門經濟》、《澳門教育》、《筆匯》、《澳門寫作學刊》、《澳門現代詩刊》、《鏡海詩詞》、《語叢》等等***。至於每年出版的本地中葡學者的著作，也不下幾十種。隨着高等教育的發展，新一代的作家不斷湧現出來。中國社科院楊匡漢教授於1996年10月26日的文學講座，談到澳門文學的特色時，就說到澳門有一支老、中、青搭配的創作隊伍，澳門每平方公里就有兩個詩人，若按人口的百分比來計算，其擁有作家和詩人的人數或許可列入世界之最。暨南大學饒芃子教授在林中英編選的《澳門散文選》序言裏說，“澳門文壇，……散文創作實際上也是‘熱’的。只就選入本書五十七位作者的一百一十四篇作品看，澳門的‘散文角’還是有它的一方風景。”可以肯定，隨着“量”，必有“質”的提升，文化水平和文化內涵，必然也會不斷提高，會出現新的發展和突破。

* 本文改自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澳門社會及東西方文化》年會上的發言。

**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導師

*** 編者按：自一九九七年年頭，澳門又多了一份由澳門環境技術事務室出版的中葡雙語季刊《蓮花》環境雜誌。

文化遺產的繼承，文化事業的發展和深層的文化交流，是離不開語言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和傳送帶。本文試圖討論語言和文化的關係，語言的接觸與文化交流。同時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探討語言教學與文化交流的關係，並提出若將語言教學有意識地跟語言所承載和傳送的豐富的文化內涵結合起來，以文化交流為主要目標之一，則語言教學無論對教師和學生，都會成為更愉快的經驗，取得更佳的效果。

語言與文化

中國自古以來，就提倡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只有載道的語言文字，才能承擔起文化遺產的繼承、傳遞和發展的重任，才有無限的生命力，而在這個過程中，又豐富和發展了語言。“語言與文化是共生、共存的。語言在歷史上的宏觀演化，都由文化上的原因促成，語言的微觀演化，也往往與文化上的原因有關。”要發展文化，語言是基礎，是關鍵。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文化背景，漢語的背景是漢文化，即中國文化；葡萄牙語的背景是葡萄牙文化。要保留澳門豐厚的文化遺產，不能不考慮文化的載體，即語言問題。1999年澳門主權回歸中國，並不等於葡語和葡國文化回歸葡國，語言和文化是可以跨國的，是可以超越國家地域界線的。一旦葡語、葡國文化離開了，澳門就會失去她的特色，失去她所應扮演的、也是不可取代的角色。保留葡國文化，對澳門，對中國的對外交往很有好處。如果這一點不給予充分的重視，不採取積極有效的措施，1999年以後，葡語隨着葡國文化在澳門會出現萎縮，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緩慢的。萎縮到哪裏呢？可能退到只在宗教領域使用，可能只在極少數人的家裏使用，可能只當書面語言保存在文獻檔案中，甚至於完全消失，被淹沒在中華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現在離主權移交只有兩年多時間了。高談闊論，空中樓閣無濟於事。現在要的是具體行動和措施，例如鼓勵葡人和土生葡人繼續留澳服務，落地生根；培養相當數量的中葡雙語精英；要辦葡語學校，最好辦幾間葡萄牙學制的葡童葡語學校，可以自成體系（如同澳門一些教會辦的英文書院那樣），以葡語作為授課語言，畢業後可以去葡國升學進修，然後回澳服務，繼續發揮橋樑作用。

澳門的語言文化景觀

今天的澳門語言文化景觀，也是令人嘖嘖稱異的。在澳門這微型天地裏，除了中、葡、英三語外，來自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遊客，從海陸空川流不息地進出澳門，說的是各國的不同語言。人們也愈來愈注意到，澳門居住着五萬多歸僑，他們在不同的場合，會交替使用祖籍方言，不同口音的“普通話”，甚至繼續使用原僑居地的語言——印尼語、緬甸語等，有時也會幾種語言混合使用。近年講普通話、新加坡“華語”，特別是台灣的“國語”的人也愈來愈多了。說閩方言、吳方言的人士也有增加的趨勢。新馬路的金鋪、商店貼出告示，自豪地說他們的職員會說普通話，歡迎使用人民幣。人們若留心聽一聽菲律賓家務助理的語言，不能不佩服他

們的語言溝通能力：美式英語加西班牙語（這點西班牙語又幫助她們與說葡語的人士溝通），若遇同鄉姐妹，則講回他加祿（Taglish）語。這種語言“大拼盤”“大匯合”充分反映它們所載的澳門文化特性：開放性、重商性、兼容性，或重商性和科學性，開放性和兼容性以及邊陲性和反叛性。當然，澳門的語言文化寶藏還有待進一步開發和深入研究，例如在澳門四百多年的歷史上，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期和澳門文化的繁榮期，都有中外史學家對澳門進行過研究，留下寶貴的史料。目前中西文化交流出現空前活躍和繁榮的景象，但對於澳門語言文化的研究，還嫌過於膚淺。例如，在讚嘆澳門多姿多彩、生動活潑的語言景觀的同時，學者們都贊成澳門是語言教學的研習場和理想園地，是語言學家英雄用武之地。但在澳門這樣複雜的社會語言環境裏，到底有多少人在甚麼場合使用何種語言？語言與就業、權力、機會均等有何關係？語言運用能力，準確度，語言傳意的層次和內涵，都直接影響文化交流的質素，甚至影響到是否真正達到交流的目的。一味地講交流，而不管交流質素和目標，怎能算交流呢？另外，在澳門多語接觸，會向甚麼方向發展呢？一般說來，語言接觸有四種結果：1.語言的同化；2.語言的借用；3.語言的雜交；4.雙語現象的產生。在澳門，四種情況都可能存在，程度不同而已，而且還在不斷的發展和變化。至今在澳門，中英文的接觸仍遠遠多過中葡文的接觸，結果也比較明顯。不過近年也有新的發展，僅舉一最簡單的例子：“搵番個條 Lei(法律)來睇下”“係咁先，Amanhã (明天)啦！”將來會如何發展？很值得關注。

語言教學與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的深度和質素，取決於其載體和傳送帶的語言。而語言的準確、熟練和表達能力，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語言教學的質素和效果。然而，綜觀今天的語文教學，尤其是外語教學，其整個過程無論從教學目標、內容、方法到評估，都很少考慮到文化因素和文化交流的目標。南京大學史學教授黃鴻釗先生在他的《論澳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一文中，提出“體上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是通過以下幾種情況實現的：1.中葡商人生意交往，相互溝通，進而習染文化。漢人“椎發環耳，效蕃衣服聲音”，葡人也有穿漢服講漢語；2.天主教是西方文化的象徵，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擴大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傳教士開頭只是為了傳教的需要而不得不學中文、講漢語，竭力適應中國的風俗習慣，甚至自己變成中國人。但當他們鑽研中國典籍，瞭解中國國情之後，便深深地被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所陶醉，於是他們努力使自己成為漢學家，積極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3.洋學堂的建立和文化典籍的互傳，加大了文化交流的力度。……1594年12月1日聖保祿神學院的建立，是澳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這所學院……把許多西方人培養為中國通，進而成為漢學家。同時又把許多中國人培養為通曉西方的人才。因此可以說它是遠東漢學家和西方人才的搖籃。”。總之，優秀的雙語人才，是在雙向的文化交流中錘煉出來的。仔細研究當時聖保祿學院的課程內容和目標，也是很有啟發性的。“學校課程分為三類，……其中漢語為必修課程，課時最多。學生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歐洲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目的是培養他們成為精通漢語、熟悉中國國情、風俗與禮儀的人才，以利於傳教；二是中國和日本等東方國家的教徒，目的是使他們精通拉丁文天主教義，以便參加傳教工作。”。因此，目標是很明確的：通語言，識文

化，以利傳教。劉羨冰校長在她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一書中詳細地介紹了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才的培養和他們的輝煌成就。澳門曾孕育了西方最早的漢學家，培養出傑出的語言人才，創作、撰寫和翻譯了大量的中西宗教和科技經典。他們肩負傳播文化的使命，刻苦學習語言文化，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成長，又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的貢獻。這些成就也說明當時語言教學是成功的。當然，跟今天相比，畢竟是時代不同了，那時挑選的學生都是“資質聰穎”，學習目標明確，刻苦鑽研的精英，與今天的普及義務教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重者儘童兒。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以及“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所描寫的坦誠開放的溝通胸懷和文化氣氛，仍是我們今天應該學習和借鑑的。

因此，我認為在設計語文課程時，無論是目標還是內容和方法應多考慮文化交流的承擔。“語言至少有兩套規則：一是結構規則，即語音、詞匯、語法等；二是使用規則，即決定使用語言是否得體諸因素。……語言的使用規則，實際上就是這種語言所屬文化的各種因素”，“赴葡就讀計劃”和赴京就讀，效果比較好，就是因為所接觸的語言載着豐富的文化內涵，反映現實生活，關係切身利益，而不是單是無關痛癢、枯燥無味的語法條文和詞匯。近年“赴葡就讀計劃”還包括了“與葡萄牙文化融合”這一門課程。近幾年本澳出版的兩、三套葡語課本，很着重中葡文化交流的內容。例如教育暨青年司1995年出版的《初階葡語》(Ora bem...，作者：Edite Domingues e Maria José Grosso)，一開頭就是一幅有動感的世界地圖，一道閃閃發光的金環，把中國澳門和葡萄牙連在一起。《說葡萄牙語》(Falar Português)第二冊開宗明義說明該書取材於文化生活。教育暨青年司於1990年出版的《繼續說葡語》(Continuar a Falar Português)採用的是單元教學，頭三個單元就是“澳門的現在”，“澳門的過去”和“澳門的將來”。可惜英語教材因多取於香港和外地，且在教法上多着重語言項目，變成為語言而教語言，最多加一些交際功能。例如為了教學生表達取捨這一交際功能，教師可能會按以下的步驟來教學生：

1. Prefer A to B (取A捨B)
2. I prefer A to B (我寧取A而捨B)
3. John prefers this book to that book (約翰寧取這本書而不要那本書)

至此，教師用演譯法把句型教完，然後給學生一些練習，再不就是提點學生prefer的過去式為preferred，讀音為 / pri' f3 : d /，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若能再進一步說出：I prefer Chinese food to Portuguese food. 這就有希望跟澳門的飲食文化沾上邊，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且能學以致用，這需要教師花點心思。在文學創作上，我主張“為情造文”，而反對“為文造情”。但在外語教學方面，在選擇內容和編寫教材時，我主張可以兩者兼用。例如一些為初學英語的兒童編寫的課本，往往是這樣開始的：

I am John.
I am Mary.
Hello, John.
Hello, Mary.

I'm Kitty.
You're Betty.
She's Anna.
Hi, Kitty.
Hi, Betty.
Hi, Anna.

其目標是教學生打招呼、自我介紹這些最簡單的交際功能；讓學生認識最常用的系動詞“be”，隨人稱的變化（am, is, are）及其縮寫形成（I' m, she' s, you' re）；學會幾個最常用的英文名字（Mary, John, Kitty, Betty, Anna），再加上打招呼的用語“Hello”和“Hi”，所教的語言項目不算少。但實際上，學生並不一定真有機會用得上這幾句英文。而且要學的生詞也有十多個。這樣的教材，因沒有花心思“為文造情”沒有載上文化內涵，顯得呆板、空泛、單調，激不起學生的情感和興趣。而教師若年復一年的用這樣乾乾巴巴的教材，也會覺得沉悶、無奈，他們的才幹得不到發揮，他們的本領、技巧，也難以施展。現在請看下面這首短詩：

Birds have nests:
We have home.
Macao is our home,
Where East meets West.
Go east,
Go west,
Home is best,
Go east,
Go west,
Macao is best!

這首詩跟上面那篇課文比較，雖然兩者的內容不同，交際功能也不同，但長短和詞匯量大致相同，所教的語言項目基本一樣，師生所花的功夫也相若。然而這首詩承載了豐富的、具有澳門特色的文化內涵，“home”“nest”和“Macao”使孩子感到親切，引起興趣，易學易記。雖然重複幾次，但並不覺沉悶，加上整齊明快的節奏韻律，很容易朗朗上口，孩子們學得輕鬆愉快，印象深刻，還可以培養他們交流意識和歸屬感。而且老師在教學方法、運用多媒體和輔助教材等方面，有更多的發揮機會。例如可結合課文，給孩子看澳門的風景圖片、名勝古蹟，甚至世界地圖等，把學習外語跟文化結合起來。即使單從語言來看，詩的語言內容也豐富得多，但並不難學。我們教初學英語兒童的教師，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實驗：用這兩篇東西做課文，看看孩子有甚麼不同的反應，可採用甚麼方法教，孩子們對詞匯的掌握，以及朗誦的表現等等。相信實驗的結果也會加深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另外，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外語教學也有日新月異的發展，尤其是沿海版教材，充實了很多文化內容。例如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義務教育實驗教材（沿海版）英語初中課本，將“Every day Activities”（日常活動）跟家庭生活結合起來；將“Weather & Places”（天氣和不同地方）跟旅遊連繫在一塊；而“Telling

Time & Date”（時間和日期）則包括了節假日的慶祝和不同國家人民的不同生活方式，等等，也是值得澳門的老師學習和借鑑的。

結 語

總觀澳門幾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凡致力於文化交流和從事中西文化研究有成就的學者，其自身往往也是傑出的語言學家和翻譯家。九十年代的澳門充滿着機遇和挑戰，既燃起人們的希望，又令人陷入深沉的思考；既令人振奮，也讓人費神去求索。小小的澳門，以其獨特的語言文化特色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典範。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用新的眼光、新的姿態和胸懷，繼續保持和發揚澳門語言文化特色，繼續搭橋鋪路，貫通中西，做出新的貢獻！

參考書目

- 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六年。
- 隋廣軍等，《澳門觀察與展望》，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黃鴻釗，〈論澳門文化的形成和歷史地位〉，《行政》雜誌第33期，一九九六年。
- 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 繆鴻基等，《澳門》，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 程祥徽主編，《澳門語言論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一九九二年。
- 鄧炎昌等著，《語言與文化》，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 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四年。
- 魏美昌，〈澳門文化論稿兩題〉，《文化雜誌》第26期，澳門文化司出版，一九九六年。
- leong, S. L., "The Teaching of Languages in Macau", Hou Keng, 1989.
- Kramersch, C.,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